

二 附刻和单刻本年谱

清代单刻本的年谱不多，通常是以附刻本的面貌出现。谱主多系大名人，有其他的文献行世，他的年谱就附刊在某个文献里，或作为某人文书汇编的一种，如曾国荃的年谱就刻于他的《曾忠襄公抚鄂公牍》之后，梁章钜的《退庵自订年谱》就同他的《退庵随笔》、《南省公余录》等书合刻，周盛传的年谱附刊于《周武壮公遗书》。清亡以来，人们仍有这一习惯。如台北文华出版社于1968年印行《王观堂先生全集》时，将赵万里著的《王静安先生年谱》作为附录梓行。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被中华书局视做康有为学术著作之一梓刻于1992年。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缪荃孙的《艺风老人日记》，把他的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当做附录印刷行世。附刻也有出现在研究成果里的，《唐廷枢年谱》，附录于汪敬虞著作的《唐廷枢研究》。

年谱的单刻本，在清代大多是谱主家族所枣梨，后世则多数由公共出版社印行。近来多少有一点倾向，即地方出版社为本籍人士出年谱，如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印行毛注青的《黄兴年谱》，1985年刊刻黄丽镛的《魏源年谱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在1983年推出任道斌的《方以智年谱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印行《吴梅村年谱》等。谱主的社会特征与出版社的专业性质对年谱的刊行也有一定的关系，如画家黄宾虹（公元1865~1955年）的年谱——《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》，即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5年作为《中国艺术家丛书》之一来印行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主编纪昀的年谱——《纪晓岚年谱》，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印行，大约也是事业一致的缘故吧。籍贯、业务关系只是年谱出版的一些因素，没有这些关系的也有出书的机会，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梓行张国华等人的《沈家本年谱》（初编）等。

晚近的单行本年谱，分量都较前期出品为大，附录增多，除了关于谱主的历史资料之外，必有参考资料书目，这在清代的年谱是偶尔出现，且书目内容也有限，近世年谱书目甚详，为前时所不能比。近日出书的《吴梅村年谱》更增添了《本谱人名索引》，为查找谱主与他人的关系提供线索，做法是凡年谱正文所出现的人名（含姓氏、官称、字号、有名无姓者）皆行收入，依姓氏笔画排列，注明其出现在年谱中的朝年，若系谱主家属，则写明其与谱主

关系。如冒襄,下注:“万三十九、顺十七、康二、康三、康五、康六、康十。”(该书第六一〇页)即其人其事记载在万历三十九年、顺治十七年、康熙六年等年份,依此检索,甚为方便。

三 年谱的研究与工具书

前已说到,对年谱的研究清人已有所开展,蒋彤、王昶、冒广生等皆有见解。迨后,李士涛、陈乃乾、梁廷灿、杨殿珣、洪焕春、蔡尚思、来新夏等人均有成果问世,而来氏更显著。

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,本章开篇已说过的话不必再说,现在具体叙说它的结构、内容特点。全书分六卷,前五卷为正文,末卷系附录。正文按谱主的生存年代为顺序,卷一是明清之际人物,卷二系顺治、康熙、雍正时期人物,卷三系乾隆时期人物,卷四是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时期人物,卷五为生于清而卒于辛亥以后人物。卷内分别介绍一部部年谱,对每一部谱,要说明那些年谱目录书籍上有著录,若有误记,则以“新夏按”指出或讨论;谱主生平,包括字号、籍贯、功名、生卒年等内容;编著者与谱主的关系,或对于谱主的研究;年谱所记录的谱主经历、要事、特点;关于年谱的序跋,或他人的研究,或附录内容;对年谱价值的评述,对有的谱还能指明具体史料的用途。经过这些方面的叙述,令读者对该谱有个初步的然而较为准确的认识。附录有两项,一是《知而未见录》,即见于某种工具书里的年谱,但未曾寓目,遂把所知信息介绍出来。二是两种索引,其一为《谱主索引》,即由谱主的姓名去查找其年谱在书中的页码,办法是依谱主姓名笔画编排,名下注其生卒年和其年谱所在的页码;女性为谱主的,则注出其系某人之母;僧名,则加注俗名。其二是《谱名索引》,用谱名查找年谱在书中的位置,做法是按书名笔画为序,写出书名、谱主所在页码,若谱主不只一部年谱,加注数量。总起来说,《知见录》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,全面分析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(实即本书作者所说的清人年谱)的总体特色和每一部年谱的具体要点,又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工具书,要了解清人年谱必须很好地利用这部书。

《中国历代年谱总录》,杨殿珣编,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梓行。著录各个时代历史人物的年谱,介绍年谱书名、作者、卷数、版本、谱主姓名及其生